

不断汲取生活的源泉 (下)

刘庆邦

去小煤矿下井

到用骡子拉煤的小煤矿定点深入生活,让我收获颇丰,尝到了甜头。过了几年,我觉得上次深入生活得来的存粮吃得差不多了,打算再次到小煤矿去挖素材。在蔚县的咸周煤矿期间,我一直想到井下看看。据说骡子有夜视力,人下井,头上须戴矿灯照明,而骡子头上不用带矿灯,在黑暗中可以行动自如。我想看看骡子在井下的劳动状态。可矿上保卫科的杨科长以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为由,坚决拒绝我下井,给我留下了遗憾。煤矿真正的生产现场是在井下,不到井下看看,深入生活就不算到位。再到别的小煤矿,我一定要下井。

我这次选择的小煤矿,是河南郑州煤业集团公司井田范围内一座小矿,叫三五煤矿。小矿所开采的是浅层的“鸡窝煤”,并不与国有大矿争资源。国家号召整合煤炭资源,三五煤矿被整合到了郑煤集团旗下。三五煤矿还是由个体煤老板自主经营,只是他们出产的煤炭产量要计算在集团公司的账户内。这种整合,说是为了扩大规模效应,其实跟弄虚作假差不多,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。我对郑煤集团比较熟悉,它的前身是新密矿务局,在1978年春天,我就是从这里调到了北京的煤炭工业部。虽说我已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,那里仍有不少朋友和老乡。比如时任集团公司的董事长,业余时间喜欢写诗,就是我的朋友,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我不能找他,请他安排我去小煤矿——要是找他的话,他安排的一系列照顾和优待,会把我包围起来,使我很难真正深入下去。我打电话联系的是我的一个小老乡,他在矿工报当总编。我让他给我找一个可供我深入生活的“小煤矿”,并告诉他,我此时去的小煤矿,他一个人知道就行了。老乡跟我开玩笑,说明白,我们像是在做“地下工作”,须保持单线联系。

2010年5月22日,我坐了一夜火车,第二天一早就到了郑州。老乡接上我,在车站附近的饭店用早餐。不知为何,我的牙突然疼起来,见凉疼,遇热疼;碰硬的东西疼,吃软的东西也疼,一疼一头痛,一疼两眼泪,真要命!怎么办?不去小煤矿了,打道回京?那不可能!生命的过程总是会生点儿这病那病,我没那么娇气,自信息志力还算可以,不至于因临时性的牙疼,就放弃计划中的小煤矿之行。老乡看出了我的牙疼,建议让我去医院看看。我说没事儿,咱们出发吧。驱车两个多小时,我们绕过国有大型煤矿,来到了藏在山沟里的私营小煤矿。小煤矿条件简陋,没有招待所,他们只好让我住进工人宿舍,和两个年轻的矿工住在一起。季节到了夏天,苍蝇们已经很活跃。我一路进宿舍,一群苍蝇嗡嗡地飞起来,像是在对我表示热烈欢迎。老乡说:刘老师,在这,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了,怎么能让您住在这样的地方呢!我说没问题,工人能住,我为啥就不能住呢!我也当过工人,当年我们还四个人住一间宿舍呢。我还有一个意思没说出来,这次到小煤矿,我设想的就是——竿子扎到地,跟工人同吃同住,住在工人宿舍里,正符合我的愿望。

一间宿舍里放三张木板床,那两个青年矿工先入为主,睡在靠里面的两张床上,我只能睡在靠门口的那张床上。床上没有枕头,我把自己带的书和衣服放在床头当枕头。矿上发给我一百元饭票和两只搪瓷碗,说话到了吃午饭的时间,我拿上饭碗,到矿上的食堂排队吃饭。以前在煤矿和煤炭部机关,我都是在食堂里排队买饭吃。自从2001年调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之后,作家变成了“坐家”,就再也没有跟工人们一起坐在食堂的餐厅里吃过饭。餐厅不大,只有几张桌子,吃饭的工人在餐厅里坐东一个、西一个。餐厅的墙上挂有电视机,电视机里的人在用嘴说话,餐厅里的工人在用嘴吃饭,两者互不影响。我排了一会儿队,花四块钱买了一份小饺子,找到一个空座位,坐在那里慢慢吃。我一个个都不认识,别人我也不认识我。这使我回想起四十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,生出一种久违的感觉。

我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,一边吃饭,一边打量周围吃饭的工人。这一打量不要紧,邻桌有一个矿工,立即引起了我的好奇和注意。他的头是黑的,脸是黑的,耳朵、眉毛、鼻子等,都是黑的,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。矿工从井下的煤窝里走出来,一般都是先到澡堂里洗个澡,然后再到食堂里吃饭。他没有洗澡,去灯房的窗口交了矿灯,只在食堂的洗碗池那里简单洗了洗手,就去食堂的卖饭窗口买饭去了。他买了两个白馒头,一碗杂烩菜,外带一瓶酒,就坐在桌前吃起来,喝起来。他赤裸着上身,胳膊和脊梁上都沾着一层煤尘。煤尘附着在他胸前的汗毛上,使汗毛变得有些粗壮。汗水从沾满煤尘的脊梁上流下来,像是一道小溪。他一定是饿极了,吃饭吃得可真香。那么大的白面馒头,他一口就几乎咬掉了馒头的三分之一。在咬馒头时,他嘴唇上的煤粉沾在了馒头上,给白馒头留下了一道黑印儿。他并不认为黑



本文作者(中)在河南大平矿采访

印儿是什么脏东西,第二口就把带黑印儿的馒头吃掉了。他一定是渴坏了,喝啤酒喝得格外痛快,用牙啃开啤酒上的铁盖子,一口气就喝下了半瓶。像他这样不洗澡就直接跨进食堂吃饭,在国营大矿的食堂是不允许的,只有在管理不甚严格的私营小煤矿,我才有机会看到这样不拘一格的生动人物形象。之所以选择到小煤矿看生活,不就是希望看到这样的形象嘛,这样的形象,不就是我的文学对象嘛!可惜我去食堂吃饭时没带照相机,要是带着照相机的话,在征得矿工的同意后,我愿意把他的形象拍下来。拍照的想法启动了我的文学想象,我继续想,要是一位油画家,看到这位带着煤黑吃饭的矿工,提出为这位矿工画一幅画,矿工会是什么态度呢?是同意为他作画?还是不同意为他作画呢?尚未发生,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,正是我们这些小说创作者的用武之地。推己及人,我想矿工不一定会同意画家为他画像,因为出于自尊,他不愿意带着一脸煤黑出现在画面上。我接着想象下去,倘若画家愿意出钱,请矿工给他当模特,矿工愿不愿意呢?我这样的想象,无疑是小说的想象,等于我的创作构思已经开始了。我想象的结果是,矿工不为金钱所动,不管画家出多少钱,矿工都拒绝为画家当模特,画家出钱越多,矿工拒绝得越坚决。我为自己的想象所感动,觉得下矿第一天就采到了“矿”,一篇短篇小说已经呼之欲出。果然,一回到北京,我很快就把这篇小说写了出来,小说的题目叫《皂之白》,发在《北京文学》2011年第8期的头题位置,并获得了当年《北京文学》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同是当过矿工的评委会主任陈建功,对这篇小说很是赞赏,他说小说写出了煤矿工人清洁精神和生命的尊严。

在我的一再要求下,三四天之后,矿上终于同意让我下井看看。矿上为了保证我的安全,派两个人陪我下井,一个是技术员,另一个是安全检查员。这天早上八点多,我们乘竖井的罐笼一来到几百米深的井下,我就看到了井筒的哗哗淋水,闻到了井下朽木和蘑菇的气味,听到了抽风机的轰鸣,踩到了黑色的泥泞,等等等等。我想起了自己下井当矿工的青春岁月,想起了生死与共的工友,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,甚至有一些感动。这让我体会到,我下井并不是寻找变化,而是重温不变,寻找记忆。找到了记忆的记号,一些记忆才会被重新唤醒。

在井下变电所休息时听技术员和安检员交谈,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我又得到了一个小说素材。他们谈到,最近有一个采煤工失踪了,采煤工的老婆认为她丈夫是死在了井下,天天到矿上哭闹,要求矿方赔钱。矿方不承认井下死了人,因为最近井下没有透水,没有着火,没有发生大面积冒顶,怎么会死人呢。矿方怀疑,这出闹剧的幕后可能是矿工夫妇玩的一个阴谋,矿工藏匿起来,由老婆出面向矿方讹钱。双方相持不下,十多天过去了,事情仍未见分晓。我觉得矿方的怀疑有一定道理。可是,一个大活人,隐藏起来也不容易,肯定不能藏在自己家里,他会藏到哪里去呢?藏起来不易,走出来更不易。藏来藏去,他有可能自我迷失,再也回不去了。根据这个想法,我回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《失踪》,发在2011年第5期《十月》文学杂志。

那次到小煤矿深入生活之后,我一共写了五篇短篇小说。其中有一个短篇《两个矿工和一个女孩子》,是十多年之后才写出来的。这表明,素材是放不坏的,它像煤炭一样,不管在地底放千年万年,一旦取出来并点燃,仍然可以释放热量,温暖人间。

不写她们誓不休

我在煤炭系统工作三十余年,对煤矿工人的生活了解得更多一些。早些年,全国煤矿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不高,安全生产状况不是很好,每年都有不少年轻的矿工在事故中丧生。我作为《中国煤炭报》的编辑、记者,多次到事故现场参与采访报道。每次报道矿难,都使我的情感受到冲击,心灵受到震撼,留下

了痛苦而难忘的记忆。1996年5月21日,河南平顶山十矿井下发生了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,84名矿工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一听到消息,我连夜坐车,第二天就赶到了矿上。这次我不仅写了新闻报道,还发挥了文学写作优势,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纪实文学作品。我运用细节化的写作手法,强忍满眼泪水,比较详尽地记述了事故给五家工亡矿工家属造成的痛苦。我一改过去报事故只算经济账的惯常做法,尝试着算一下生命账,也就是说不算物质账了,算一下精神和灵魂方面的账。我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,矿工工亡所造成的痛苦是连带性的,而不是孤立的;是深刻的,而不是肤浅的;是长久的,而不是短暂的。通过作品,我呼吁煤矿的管理者尊重矿工的生命价值,真正对矿工的生命安全负起责任。

以《生命悲悯》为题的作品发表后,在全国煤矿所引起的强烈反响,让我有些始料不及。煤炭工业部一位主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,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,信上说:“作者从生命价值的角度,以对煤矿工人的深厚感情,用撼人心灵的事实,说明搞好煤矿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特别的紧迫性。”副部长建议:“煤炭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,特别是从事安全生产管理的同志读一下这篇报告文学,从中得到启示,增强搞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。”一时间,对这篇作品,全国各地煤矿的矿工报在转载,广播站在广播,班前会上在朗读,文艺队改编成节目在演出,纷纷把作品当成了安全生产教育的教材。我还听说,有的矿工的妻子把作品拿回家读给丈夫听,读着读着读不下去,夫妻抱头痛哭。这一系列积极的反馈,提高和加深了我对文学创作意义的认识,我认识到,用文艺作品为矿工服务,不只是一个宣传口号,也不是一句虚妄的话,而是一种俯下身子的实实在在的行动,是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,良心之功,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。有了这样的认识,我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,不能写一部长篇小说,更全面、深入、艺术地、有分量地表现工亡矿工家属的生存状态呢。想法一旦生出,我就把它固定下来,变成了我的一个心愿。长篇小说是一个大工程,它不像写一篇纪实文学作品那么快,那么容易。仅仅靠在纪实作品的基础上发挥想象是不够的,还必须到发生过矿难的煤矿生活一段时间,收集大量的素材,才能投入创作。

我还没找好去哪个煤矿定点深入生活,听说有几个煤矿接连发生事故。2004年10月20日,河南大平矿发生瓦斯爆炸,148名矿工遇难。2004年11月28日,陕西陈家山矿发生瓦斯爆炸,死亡166人。2005年2月14日,辽宁阜新孙家湾矿发生的瓦斯爆炸更加惨重,遇难人数达到了214人。天哪,在前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,就有五百多条宝贵的生命突然丧失。这意味着又有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,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子,多少子失去了爸爸。将心比心,让人何其惊心,多么痛啊!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鞭策着我,催我赶快行动起来,去关注那些“天”塌下来之后的特殊生态群体。我选择了到阜新孙家湾矿深入生活。我做了充分准备,打算在矿上多住些日子,至少住十天吧。到了阜新我才知道,深入生活并不那么容易,不是自己想深入就能深入下去。我只到了矿务局,还没到矿上,局里管宣传的朋友知道了我的意图,就把我拦下了。他们对我很客气,一口一个老师叫着,好吃好喝地招待我,拉我去看这风景,那古迹,就是不同意我到矿上去,不给我与工亡矿工家属有任何接近的机会。我在矿务局漂浮了两天三夜,急得抓耳挠腮,一点儿办法都没有,最后只得快快地回。去阜新深入生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,使我对自己的心愿能否实现有些怀疑,也有些悲观,觉得自己心愿恐怕难以实现了。任何心愿的实现都需要条件,都不是无条件。我的条件就是对生活的依赖,就是需要大量活生生的材料,没有材料作基础,那是无法想象的。

我还是有些不甘心,受心痛的逼使,没有放弃自己的心愿。我暗暗对自己说:你要是写这部书,就对不起那些死难的矿工兄弟,对不起那些工亡矿工家属,也对不起自己的使命、责任和良心。转眼多少年过去了,到了2013年,我申报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,决定到河南郑煤集团的大平煤矿深入生活。郑煤集团的前身是新密矿务局,以前我在矿务局宣传部工作过,有不少朋友和熟人,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的行动。当年中秋节前夕,我正准备前往大平煤矿时,收到了墨西哥孔子学院的邀请,他们为我翻译出版了一本西班牙语的中短篇小说集《神木》,邀我去墨西哥和读者进行交流。以前我没去过北美的墨西哥,很想到墨西哥走一走。可是,因为时间上的冲突,如果我答应去墨西哥,定点深入生活的计划就有可能落空。想来想去,我还是谢绝了墨西哥

方面的邀请,坚持向近处走,不向远处走;向熟悉的地方走,不向陌生的地方走;向深处走,不在表面走;在一个地方走,不到处乱走。去矿上的前一天,我在日记本上给自己约法“四多四少一定”,即:多采访,多听,多记,多思索;少喝酒,少应酬,少讲话,少打手机;定下心来,真正深入下去。我在郑州的煤炭界、新闻界和文学界,都有不少朋友。中秋节放假期间,有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,请我喝酒,或到矿上看我。我一一回绝了他们的好意。就在中秋节的那天中午,我买了月饼和水果,独自一人登门去看望一位遇难矿工的妻子和她的儿女们。我还让她的女儿领着我,特地到山坡上遇难矿工的坟前仁立默哀。我看到坟后长起了一棵桐树,桐树已长得有两丈多高。我在大平矿定点生活结束时,矿上举行了一个仪式,矿党委书记张海洋和矿长李志愿郑重地为我颁发了一本证书,授予我大平煤矿“荣誉矿工”称号。

回到北京后,我把深入生活得到的材料,加上以前多次采访矿难积累的素材,加以整理,糅合,消化,一打上自己心灵的烙印。开始写作前,我对自己的要求是,要悲而不怨,哀而不伤,始终贯穿大爱情怀。把这部书写成心灵画卷,人生壮歌,生命赞礼。争取让读者读后,既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,又可以从中汲取不屈的精神力量。从2014年6月29日动笔,日复一日地写到年底的12月25日,意犹未尽地为这部将近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结了尾。小说的名字叫《黑白男女》。小说在2015年第4期《中国作家》首发,随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小说出版后,被评为“2015中国好书”,并先后获得了第九届《中国作家》鄂尔多斯文学奖、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和第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最高荣誉奖,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2023年3月16日至4月11日(其中清明回老家一周),于怀柔翰高文创作和光照家园

一位诗人

胡钦文

如果你有机会到白河,到那秦楚相交的小城,你一定能见到他。我相信,你还能一眼瞧出他是位诗人。

他中等身材,因瘦骨嶙峋,显得个儿高。头发染作黄色,又蓬又卷,遮没了眼睛、前额,甚至能遮住上半张脸。或许,他喜欢透过这层头发来看世界,因为这样,世界会显得遥远。这是我的猜测,具体原因是什么,谁知道呢?最有特点的还是他的衣着。无论冬夏,无论春秋,他总穿着黑色的紧身裤;上衣似乎只有两件,一件黑底碎花衬衣,一件大红皮外套。如果你见着这样一个人,且先驻足。你可以细细观察他。他如果不苟言笑,落落寡合;他如果独伫立,仿若石雕;他如果走起路来又缓又慢,双手如汽车雨刷似的在身前后摆摆,那么他便是我要说的这位诗人了。

我与这位诗人打过多次照面,然而一句话也没说过。

最早一次见他,是2012年9月份。那时,我们高一新生在县体育场军训。我们在塑胶跑道上走正步或齐步走时,常瞥见跑道内侧人造草坪的边有一个,亭亭地站着。他两手提包,垂于身前。他极瘦,衣服直像是挂在身上。偶起微风,他的头发、碎花衬衣便开始轻摆。他会习惯性地把手提袋换到左手,却不侧怜,依旧将那袋子垂在身前,端端地站着;同时,他用右手顺着鬓角轻轻整理头发,动作妩媚。

有些很客气的同学背地里说他很“娘”,传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我并不了解他,不敢发言;碍于朋友关系,我也从不敢打问,从不表现出一点对他的好奇。但我常常想,这个人为什么总站在那里呢?

军训间隙,偶尔,我们会去树下休息。不止一次,我看见他将自己的包打开,从里面掏出些印有文字的纸。不久,他的身边就会稀稀地站着几位同学。我很想知道那手提包里究竟装着些什么,很想看看那纸上印着什么,然而从没有去问过、看过。

上高三时,不知怎么,某次我很偶然地与同桌聊起这位奇人。同桌用如数家珍的口气说:“他是个诗人。那手提包里的都是他的诗。”

“呀,那你看过吗?”

同桌笑了,“肯定看过嘛。怎么说呢?他写得……写得……”同桌似乎一时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。她噤了几声,说道:“他写得很有热情。就是,你能感



萝卜丰收大有年(国画) 江寒汀

选自上海中国画院“总知春烂漫”特展

可以击中任何别离过汉水的游子。

这首诗让我觉得自己找着了答案。我的确来自那个白河,它布满黄尘。那里贫困而萧索。重叠的大巴山也好,蛛网似的水泥路也好,都拦不下我,一纸录取通知书就能轻易地将我招往省城西安。

几乎在同时,我明白了:一片地域若想长久存在,一定要有文化,而文化正是由一群群文人和艺术家创造出来的。如果没有杜甫的诗歌,成都的草堂只是一间漏雨的茅草房;如果没有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和《边城》,湘西也不过是片蛮荒之地。

可惜,这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。大学某个寒假,父亲骑车载我回老家冷家。路经汉江时,我说自己想看看汉江,请父亲将车停下。冬夜里,汉江两岸草木凋零,一片萧索。站在江畔,看着江水东逝,我忽得想起那诗人的诗,将第一节背了出来,并长叹一声,感慨道:“好啊,好。”父亲不明白我怎么了,颇有些不快地说:“你这娃子。不得了。”我向他解释,并提说这位诗人怎么了不起。父亲只是抽烟,末了,将烟头往水里一丢,说:“我们这些不懂诗。不知道他们说啥。他要是在我们面前叫唤,我们把他们当个啥?当个疯子!”

那以后,虽然我还偶尔在网上看到他的消息、读到他的诗,却不再跟家人任何人提说了。

我大学生涯最后一个寒假是在县城度过的,那是2018年。一天晚上,我照例出去散步。照例,在县体育场。我那时很为自己的前途操心,没仔细看过周围的事物。走到第三圈时,才发现运动场进门右侧不远,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他依旧穿着黑色紧身裤;因为天冷,他上身穿的不是那件黑色皮衣,而是大红色羽绒服。我望着他,不知因为天冷还是久站,他不时跺脚。

时隔六年,我已是成人,渐渐地失去了天真、好奇、单纯,渐渐地开始为生活的重担而忧虑。可我惊奇地发现他竟一点都没变,依旧是那份穿着,依旧那样落落寡合,依旧像风中的大理石雕塑。我想,他也一定依旧默默写着诗歌。

那时,我很想去和他打声招呼。犹犹豫豫,终究没去。现下想来,没去扰他也好,因为他是一位诗人。

笔会

谈艺录

“文汇报”微信公众号